

美国在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上的 双重标准

韩永文

摘要：美国不断加剧升级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双边教育、科技、文化交流进行限制，不顾中国政府理性推进两国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的磋商诚意，出尔反尔，无视市场经济法则和世界贸易规则，背弃市场诚信和契约精神，恣意推行单边主义，是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这只会破坏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世界经济秩序，破坏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全球经济协调发展。而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启示，中国经济发展会愈挫愈坚，行稳致远。

关键词：市场经济 国际贸易 双重标准 市场诚信 契约精神

作者简介：韩永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自 2018 年 3 月 8 日美国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加增关税开始，又于 3 月 23 日、4 月 3 日、7 月 11 日连续提出了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增关税。从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增关税，到宣称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全部商品加增关税；从加征关税 10% 到加增关税 25%，美国在不断加剧升级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进一步发展到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易、交流，以及双边教育、科技、文化交流进行限制。2019 年 5 月，美国又不顾中国政府理性推进两国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的磋商诚意，出尔反尔、变本加厉，有意恶化中美磋商环境、破坏已经达成的磋商协议成果，给两国经贸发展、经济发展与合作关系蒙上阴影，给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这

是美国利用其世界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无视国际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无视市场经济法则、无视世界贸易规则，恣意推行“唯我独尊”“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这是逆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而动、倒行逆施的行径。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一些跨国公司的这种所作所为，是对市场经济法则的忽视，是对世界自由贸易规则的忽视。

一、美国在市场经济法则和自由贸易规则上的双重标准

市场经济是迄今世界上最有发展活力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之所以最有活力，是源于它对市场主体进行自主投资决策、自主选择生产经营与消费活动的尊重，源于它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市场竞争推进了有效市场分工，进而形成相对比较利益理论下的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与商业贸易经营分工。美国就是在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分工中崛起、获益，并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正如人民日报 2019 年 6 月 4 日刊载的钟声评论所说，“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让美国在形成全球大市场、国际大分工的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对公平竞争的坚持，向来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价值坐标”。但是，今天的华盛顿“却为一己之利”用“霸道的手”束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同样得益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1978 年之后，中国政府正确地选择了推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完善了保护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投资、自主经营的体制，形成了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和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然而，面对美国政府肆意打压全球化行为下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曾经标榜“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自由企业制度”以及“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已经忘记了市场经济自主、公平、竞争的法则，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所谓“美国优先”和所谓“美国再次伟大”的一己之利，而放弃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公平竞争法则。他们滥用关税、高筑贸易壁垒，恣意打压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甚至不惜借用各种国家机器，违背市场经济竞争规则和世界自由贸易规则，封杀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和经济技术贸易活动，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办厂，公开干涉控制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人为割断中美企业间的“产业链”“供应链”，破坏两国和两国企业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一方面自诩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标榜美国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 40 年来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操

纵西方国家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千方百计打压国际市场自由贸易竞争，肆意破坏空开、公平、合作的市场经济规则，充分暴露出其在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合则用、不合则不用的双重标准。

二、美国在市场经济信用原则上的双重标准

现代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市场诚信和完善的诚信奖惩机制。诚信、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现代国际贸易的活动准则。市场诚信制度要求，在一切市场经济活动中，任何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应该遵守“游戏规则”。对于国际贸易活动，世界贸易组织则要求各国和企业从事经贸活动中，必须“守规则、讲信誉”。然而，近两年来，面对中国的复兴崛起、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美国政府、美国的一些政客及跨国公司，心态失衡、战略焦虑、情绪失范，不惜丢弃国家间交往、经贸合作和市场经济交换中的信用准则，在两国经贸磋商中一再出尔反尔、混淆是非，滥用关税壁垒和国家机器，封堵制裁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美国政府罔顾中美贸易中包含的因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价值、在中国市场上美资企业商品制造形成的价值，以及第三国转口贸易增加值等事实，主观地、无理地、不科学地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数额。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分析，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在美中贸易逆差中，有 35%~40%的部分是由在中国境外生产但在中国组装并运往美国的商品产生的。美国的一些企业，有的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有的则直接呼应美国政府的政令，丢弃市场信用和道德，不履行已经签订的协议和已经做出的承诺，违约中断对中国企业的零配件供货，违约中断与中国企业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上带来很坏的影响。正如一些媒体所言，“美国企业执行白宫行政命令的意愿让他们此前签订的协议变得毫无法律意义。对白宫来说，如果美国不能取胜，就不存在什么正当竞争”“说好的一切自由开放都是假的”。这就是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标榜的“市场诚信”吗？这是对市场经济信用原则的背弃，是对国际自由贸易诚信准则的背弃。

三、美国在契约精神上的双重标准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石。它与市场诚信紧密相连、相互依存，是市场经济机制制约市场主体行为失范的辩证统一体。没有市场诚信和市场契约精神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市场经济运行会失序、竞争将会杂乱无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下，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

的高效有序的纵向和横向联系，是以信誉和契约为基础的。美国一直标榜其是契约国家，把遵守契约精神当作美国的符号。关于契约精神，在美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0多年前，一块埋有一个5岁男童的土地，孩子的父母因生活所迫将这块土地转让，但要求签订永远保留孩子坟墓的契约。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按照契约规定，这个男童与他的坟墓继续保留在这块土地上，永远地与格兰特总统相伴。这是一个延续了200多年，被美国奉为经典的契约故事，并被揭示为美国“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的契约信条。可如今的美国还在如此执着地坚守契约精神吗？当美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贸易磋商时，已经商定的协议内容一再被美方出尔反尔、推翻否定，这能称为是坚守契约精神吗？当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积极响应白宫的行政命令，随意撕毁与中国企业生产合作的商业协议、取消对中国企业生产供应零部件及通用技术软件等，这能称为是坚守诚信和契约精神吗？我们不能不说美国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在违背契约精神、破坏法治规则，扭曲公平竞争。正如国际上的一些媒体所评论的“美国在国际上不顾契约精神，随意撕毁契约、协议，契约都是约束别人的”。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一些企业的做法是很不道德的，他们不是在遵守契约精神，而是在抛弃契约精神。

四、美国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而动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势不可挡，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技术尤其是新的信息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催化了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催生了全球范围内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商品生产的设计、制造、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在世界各地间的细密分工和融合发展，真正形成了在各国市场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融合性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当今，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格局纽结而成的世界经济发展再一次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论断。不可否认，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分布条件下新的世界经济分工与发展，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的趋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资源获取的就近性、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劳动力尤其是具有良好知识素养和熟练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教育科技发展条件等要素成本的市场比较，引导着“理性经济人”遵循相对比较利益原则甚至是绝对比较利益原则，选择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设立工厂、开辟市场、建立研发基地。这中间，中国市场无疑是具有劳动力素质高而成本相对较低、国民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等比较优势，再加上中国的

制度优势和日益改善的投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建立零部件生产基地，甚至“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这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是资本的理性选择。事实证明，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获得了远比其他地区包括美国本土要高得多的收益。据统计，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生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 40%、英特尔在中国市场的营业收入占到其总营业收入的 23.6%，特斯拉在上海投资建厂生产电动车，中国许多地方的企业例如长沙的蓝思科技在为苹果手机、电脑进行零部件配套生产。

如今，美国政府却要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悖逆资本流动偏好的意愿，企图通过加征关税和其他一些手段，驱使美国在海外的制造业和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以图实现“美国再次伟大”。但问题是，在制造业方面特别是在一般制造业和与美国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消费品制造业方面，美国还具有比较优势吗？首先，看国内储蓄率。美国的国民储蓄率极低，政府公共预算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缺乏在本土投资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美国所谓贸易问题是自己造成的》的文章中提出，1981 年 1 月里根总统上任时，美国国内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 7.8%，两年后降至 3.7%。特朗普总统上任时，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仅为 3%，还不到里根上任之初时的 40%。储蓄率低使得美国国内投资捉襟见肘，也成为美国制造业难以振兴的痛点与障碍，还造成大规模的贸易赤字。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低，一方面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国内产业投资，另一方面市场缺乏在本土投资的意愿；美国政府公共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既说明政府储蓄不足，也表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缺乏投资供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内投资环境。其次，看劳动力成本价格。美国的劳动力价格昂贵，而加征关税又将进一步推升劳动力成本；再加上美国其他要素价格也不便宜，必然导致本土生产的商品价格远远高于海外市场的价格，使得美国本土的一般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相比缺乏比较优势。也难怪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设想无法实现。第三，看制造业劳动力供给。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尤其是技能熟练的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原本美国的跨国公司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盈利，而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再让他逆资本逐利的偏好意愿，回流到市场报酬低的地方，这是极不现实的。还要看到，由于制造业大量流出，已经使得美国国内市场上技能成熟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如果真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让外流的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因为一般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回流本土，美国将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劳动力市场价格高昂；二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劳动力专业技能和智力培训，以及相应的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培养的投入，而且因技能培训提升了质量和知识结构的劳动力价格又会上升。这几种成本叠加，必然会进一步拉升本来就高的制

制造业成本，推高制成品价格。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各国对美国在建设和遵守国际市场经济秩序、遵守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等方面发挥正向效应，引领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好方向发展，充满期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包容合作发展的大趋势，更不应该是一个经济大国的作为。目前，美国政府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不仅不能给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带来益处，也不能给美国人民的平静生活增进福祉（正如美国高盛公司所分析，“关税成本主要转嫁到美国企业和家庭身上，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推升美国核心通货膨胀率”），而只能给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世界经济秩序带来破坏，给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带来破坏。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任性地执意走下去，20世纪30年代胡佛政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殷鉴不远。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能够客观而现实地正视这些问题，不再一意孤行。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尽管贸易摩擦会给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带来一些困难，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会增加。但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发展有市场空间、有结构调整的动力和空间、有韧劲、有弹性、有回旋余地，向好发展的优势依然很多。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启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会过多地依赖外部市场，必将眼光向内进一步塑造国内需求市场，将发展建立在依赖国内市场需求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提升有强大内需支撑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借用2019年6月17日《求是》杂志署名清原的文章所表述的：“中国有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市场主体。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抵御外贸风险的有力武器。”“作为大国的人口优势、空间优势、内需优势、资本积累优势”，将为中国“提供强大的韧性、潜力与回旋余地”“中国将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坚信，中国经济发展会愈挫愈坚，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李蕊